

政治文化与 **21**世纪中美日关系

主

编

刘建飞

副主编

林晓光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政治文化与 21 世纪中美日关系

主 编 刘建飞

副主编 林晓光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文化与 21 世纪中美日关系/主编 刘建飞, 副主编 林晓光.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6

ISBN 7-5065-5105-5

I. 政... II. ①刘...②林... III. ①政治-文化-影响-中美关系②政治-文化-影响-中日关系 IV. ①D822.371.2②D822.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1443 号

书 名: 政治文化与 21 世纪中美日关系

主 编: 刘建飞

副 主 编: 林晓光

责任编辑: 张良村

装帧设计: 张禹宾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i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9.375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65-5105-5/I·837

定 价: 26.00 元(平), 36.00 元(精)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言

—

中美日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三边关系之一,它如何发展,不仅牵连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会影响世界和平。对中国来说,处理好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是战略机遇期内能否维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的最重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处理好同美日的关系,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之一。但是,中国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又是最为复杂的两对双边关系,冷战结束后,波折不断,特别是中日关系,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从战略层面讲,三国战略家、政治家都清楚,三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发展双边和三边关系,符合三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东北亚地区、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所以,单从战略角度,已很难解释中美日之间关系的现状及其复杂性。中美日关系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三国政治文化的差异。但是目前,学界对三国政治文化及其对三边关系影响的研究还显薄弱。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笔者着力研究中美日战略关系,先后出版了《中美日战略关系的演变1899—199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和《21世纪初期的中美日战略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两部著作。特别是后一部著作,是笔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同合作者——著名日本问题专家林晓光先生都感受到研究中美日关系中的文化因素的重要性。随后,我们向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提出了“中美日关系中的文化因素”课

题立项申请,并获得双方的批准。课题于 2002 年立项,2003 年结项。参加课题研究并撰写论文的都是在这个领域很有造诣的中青年专家,他们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刘建飞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林晓光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马小军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王子今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刘学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查道炯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晋林波研究员。课题主持人为刘建飞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付高仪教授、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国芬良成教授、日本立教大学高原明生教授、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会长毛里和子教授为课题顾问。

经过一年的研究,专家们分别就自己所承担的内容撰写出了高质量的论文。这就是本书的主体部分。2003 年 8 月 26—27 日,课题组在北京东方文化酒店召开了以“政治文化与 21 世纪的中美日关系”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中美日三国的 20 多位专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除了撰写论文外,课题还包括三项问卷调查,分别在中、美、日三国以问卷形式调查了三国公众对三国的世界地位、国际形象、对外政策及双边和三边关系的看法。本书将调查分析报告附在书后,以供读者参考。此外,书后还附上了 2003 年 8 月北京国际研究会的参会者名单。与会者都是北京地区最为活跃的中青年日本问题专家和美国问题专家及一些国际关系专家。

二

课题论文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涉及三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部分有 4 篇,分别探讨中美日三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国民行为的影响。这是课题的基础部分。其中关于中国政治文化有两篇,分别探讨了当今中国政治文化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刘学军教授的论文《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对国民行为的影

响》系统阐述了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来源、结构和基本特征以及其对国民行为的影响。他指出:中国的政治文化主要有三个思想来源,即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西方主流文化(主要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也处在重新分化、组合的过程中,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总体来看,当前和今后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政治文化将是由占主导地位的“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其他非主导政治文化所构成的复合体。主导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因素,同时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的合理因素,以民族性、科学性、民主性、大众性为基本特征,在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各个层面确立了全社会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选择和心理调适标准。非主导政治文化则表现为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残余和民族分裂主义价值取向,在各个方面离析和化解着主导政治文化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约束,使一些社会利益关系群体的政治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甚至完全背离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指引。非主导政治文化与主导政治文化明显对立,并对后者构成严峻挑战。客观地看,中国政治文化尚不完善,存在着弱化中国社会现代集体认同的不良因素,但总体上能够承担把中国社会各民族及其他利益群体“做成”现代集体认同的角色。从趋势上看,中国主导政治文化将更多地吸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不断克服非主导政治文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国政治文化将对中国民众的政治行为乃至全人类的政治发展产生越来越多的积极影响。

王子今教授的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及其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做了非常深入的挖掘。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历来予政治以特殊重视的古国。几千年来,中国政治史的记录没有中断。一代代最有识见的中国人往

往把自己的全部才华和毕生精力都倾注于政治生活,即政治学说的创制和政治斗争的实践中,为充实人类政治学知识宝库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于是以其内涵之宏富,在世界文明史进程中显现出复杂多彩的特色。其中既存在可以继承与借鉴的有益的内容,也有不予批判和破除则不能推动历史进步的腐恶的成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若干特色,长期对社会心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以致人们可以在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方面进入现代生活,然而在政治观念、政治意识方面却往往在一定程度上长久保留着专制时代的陈旧的烙印。他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本特征概括为 4 个方面,即“大一统”国家模式、政治形态的内在封闭性、以王治道德为政治理想、等级式政治秩序与全民性的权力崇拜。关于“大一统”国家模式,王教授指出:“大一统”的理想能够形成,又得以传布,表明华夏文化走向同一、走向成熟的历史进步迈过了新的里程碑;中国传统“大一统”政体的历史文化效应,有明显的正面的影响;但是,对于历史文化的发展也表现出负面效应。关于政治形态的内在封闭性,王教授认为:内在封闭性的特质不仅阻滞民主政治生成的作用十分明显,如果就文化进程的总体趋向而言,这种政治特色对于民族精神风貌也表现出严重的消极影响;表现出内在封闭性特质的政治体制严重窒碍着政治生活中积极因素的生成发展,扼抑着有可能推促政治文化演进的生机与活力。关于以王道德治为政治理想,王教授指出:“王道德治”的基本标志一是政治温和;二是司法公正;三是官吏清廉;四是财富平均。透视中国传统社会“德治”理想的内涵,可以看到民众意识中有关“德治”的思想倾向及其相应的文化背景。关于等级式政治秩序与全民性的权力崇拜,王教授的看法是:这种观念形态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忠”的意识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尽管“忠”作为政治道德的准则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然而,从政治文化的宏观角度考虑,必须注意到基于“忠”而产生的负面因素。

刘建飞教授在《美国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及其对国民行为的影响》这篇论文中梳理、归纳了美国政治文化的主要渊源、基本要素及其对国民行为的影响。美国的政治文化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成长于美国特有的地理条件、历史进程和社会环境。清教传统、欧洲自由主义思想以及英国保守主义思想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主要源头,它们在美国这块新大陆生根、开花,并结出了新的果实——美国政治文化。19世纪以后在欧洲特别是英国出现的许多政治思想都对美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改良主义。但是这些只是对美国政治文化起了修补、发展作用,其意义远不如上述三个因素的奠基作用大。美国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四大要素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相作用、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四大要素在塑造美国人的性格、精神、偏好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人的行为基本上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得到解释。就个人主义来说,它塑造了美国人自强、竞争、诚实的精神。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都重视发挥个人的作用,凡事靠自己,凭自己的本事,而不是靠关系、后台,也不是靠组织和集体。个人主义的消极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个人持枪。近些年校园枪击案层出不穷,几乎成了美国头等重要的社会问题,但是美国人仍然不愿剥夺个人持枪的权利。就自由主义来说,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观已经渗入美国人的灵魂深处,塑造出了美国人的民主精神和法治精神。就实用主义来说,美国人非常务实,能够接受客观现实。当然,实用主义的消极影响也是很明显的。由于受实用主义的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言论和实践往往是互相冲突的,政策不断变化,诺言不算数。民族主义对美国人的影响也体现在正负两个方面。从积极的角度看,它促使美国人具有爱国精神。从消极的角度看,民族主义也催生了美国的种族优越感,WASP至今仍是美国各种文艺作品中的

典型美国人的形象,是优越于其他种族美国人的美国人。

林晓光教授在《日本政治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基本要素》一文中系统探讨了日本政治文化的起源和构成要素。日本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构成多样、内容丰富的政治文化。其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有本国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浸润,也有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对于古代东方文化和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东、西两大文化在日本这样一个岛国上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使其政治文化具有多源、多重、多样的特点。从文化源流的角度看,日本政治文化的起源有三大方面:本土生成的传统文化;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吸收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文化。这种文化源流的多源性导致了日本文化结构的多重性与复合性。因此就日本政治文化的要素构成和结构特征而言,又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演变、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而且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二是外来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具有压倒性、主导性的作用 and 地位;三是在对于外来文化的学习利用、融会贯通的同时,基本上保持了本土的原生性文化的精髓。从内容构成上看,日本政治文化有以下几大要素:神国思想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林教授认为:对日本政治、外交,乃至民众心理、民族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作为复合型的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潮,对日本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近代化、统一国家的形成以及中央政权的建立,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不失为积极的作用。但日本近代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把“双刃剑”,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过分张扬和推崇,尤其是在国家政治生活 and 政策理念方面自我异化,走向极端化、沙文化,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实行扩张主义政策、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 and 政治理念,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蒙蔽国民,驱使国民为其侵略战争卖命的意识形态工具。由此可见,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与日本对外扩张的力量 and 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因此成为解读日本近代政治文化的一把钥匙、一个切入点。

第二部分也有4篇,分别探讨中美日三国对外政策中的政治文化因素。其中关于日本的有两篇,都由林晓光教授提供。在《民族主义:日本政治与外交的文化考察》一文中,林教授从历史进程、历史记忆、文化心理与武士文化4个方面剖析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渊源和基本特征及其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他认为,日本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是民族主义。日本民族主义根植于日本的特殊历史进程。“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富国强兵”,实行“开国”政策,推行“殖产兴业”,实现“文明开化”,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时的民族主义推动了日本的进步。然而,在学习西方、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同时接受了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论,并与“崇尚强权和暴力”的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形成了极端民族主义,其在对外政策上的表现就是急切的殖民扩张主义,把侵略、掠夺周边邻国作为“富国强兵”的政策手段,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在“脱亚入欧”的口号声中,加入了列强瓜分亚洲各国的强盗队伍。二战后,日本的民族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的思想未能得到全面彻底的清算。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增长,右翼势力死灰复燃,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也卷土重来。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对于侵略战争的否认和对历史的歪曲,并作为一种甚嚣尘上的社会思潮,从外部影响着日本的政策决定过程。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本民族的信仰崇拜扩大、外延到其他民族,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宇宙观。这种民族自大的另一面就是民族歧视,即自我民族褒扬,但同时歧视、蔑视其他民族,将亚洲发展中国家视为一堆“垃圾”,而把日本看成是耸立其上的“高楼大厦”,宣称要“告别亚洲”,从“脱亚入欧”演变成“脱亚入美”。日本政治文化深受武士文化的影响。日本军国主义曾有意识地把武士文化扩大为民族沙文主义,把武士

道精神贯穿于政治文化并用于指导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对民族文化的扭曲和亵渎。而这种政治文化在本质和功能上都完全是一种愚民政策,它的泛滥和流布造成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愚昧、心理迷失和行为的狂乱,极大地破坏了民族的健康心理和进行正常思维、理性认知的意志和能力,最终导致了法西斯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对整个民族的摧残和戕害。

在《日本的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神道思想与神国学说的历史考察》一文中,林教授对日本的神道思想与神国学说做了深入探讨。日本的政治思想和外交理念是日本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日本这个岛国环境里土生土长的神道思想与神国学说则对于日本传统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社会思想的建构、形成与发展,有着无可否认的重要作用。神道的起源是日本民族自原始社会以来形成和秉持的原始宗教信仰,它以崇拜自然神和神人合一的思想为核心,把对自然神的崇拜礼敬与神灵对本民族的保佑护持紧密结合起来,为神而生、为神而死,都是神圣的。这种原始宗教信仰虽然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意识和民族思想之中,但并无系统的理论结构和完整的思想体系,一直到公元 6 世纪,佛教思想经中国传入日本,作为原始宗教的神道思想与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思想互相渗透融合,才开始从思想理论到形态形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精髓。从此,日本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的建构和发展才拥有了明确的载体、外壳与内核。神道思想、神国学说所表现出来的自尊自崇自大的思维特征,从其诞生的一开始,不仅极大地影响和建构着日本国民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而且奠定了日本独特的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上。就日本的国情和近代以来的历史而言,以神道思想、神国学说为理论框架和思想核心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对于国家政治外交的影响基本上是保守右倾的、负面和消极的,既不利于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正确选择,也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

与稳定。

马小军教授的论文《先秦的观念与思想：中国外交理念源头初论》通过勾勒从先秦中国人的时空观念到东亚宗藩朝贡体系建立的历史线索，深入剖析了中国外交理念的起源。他先是整理了中国人上古时期即形成的五方天下观念。天穹运转，天道左旋的现象使人们生出一种天地中央螺旋形生成的观念；极点不动，天如穹盖的感觉会使人们形成一种天地均有中心和四方的观念；东西南北，春夏秋冬，一切秩序都以“我”、以中央为旋轴展开运动。人的社会与政治关系自然也概莫能外，四方环绕中央，或分为五方，或划为九州，主要是要大致划牢政治控制权所及的范围，同时又辨明“内”与“外”、华夏与四夷的异同区别。这最初无疑是自然地理对中国人文观念的影响，但这种观念一旦形成，便牢牢地渗入了中国人的肌肤血液，成为自那以来中国人判断和处理四维周边事务的出发点。华夏主流宇宙观念，在历史的很长时段中并不知道也不关心东亚封闭地理环境之外的所谓“世界”，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依东亚地理为依据的，那是以我为中央的“天下”，而且是以华夏血亲宗法为纽带的“家天下”。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种时空历史观念逐渐固化为“礼”和“礼制”，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也成为中国人与东亚环境中周边人民交往的思维与行为准绳。这就酝酿出了嗣后影响中国外交愈 2000 年之久的东亚宗藩朝贡体制的雏形。东亚朝贡体系及其观念，虽因过去 150 年西方列强的侵入而被销蚀，但中国人对此在观念上的强度却可能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增强了，间接表达了其对西方强加于东亚的国际秩序的愤懑反抗情绪。中国人在一再将列强视为“西夷”、“远夷”的同时，热衷于采取“远交近攻”、“以夷制夷”、“柔远怀德”的诸般古老策略，并在文化上始终陷于“体”“用”争执的泥潭难以自己。但是，大凡涉及东亚周边地区的政治、外交、安全事务，中国中央政权往往都不惜余力地参与，甚至不惜与列强发生战争（尽管这样的战

争往往失败,如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因为,东北亚也罢,东南亚也罢,那不过是祖先即以确定的“同文”、“同种”的华夷一统天下的一部分,与之关系不过是一类“家事”。故而,最是中国人不能理解或是不能容忍的事,大约莫过于日本不仅在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竞赛中拔了头筹,成为东亚政治秩序中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竟然与中国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战争,并曾奴役了中华民族。中国傲慢而自大的文明从骨子里是不能见容于此的。

刘建飞教授的论文《民族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阐述了美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及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他认为,民族主义在美国是很有影响的。独立战争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产物,美利坚民族要摆脱大不列颠民族的统治与压迫。这时的民族主义应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后来,随着美国的发展和强大,美国的民族主义则成了其向外扩张的动力和依据。“美国伟大”、“天定命运”、“白人种族优越”等观念都是这种民族主义的表现。美国民族主义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强权政治色彩浓厚。与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是,美国的民族主义不仅要维护自己的价值观,而且还要向外推广,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干涉别国内政,乃至动用武力。如果说,美国民族主义在冷战期间的集中体现是反共主义,那么,冷战后则是霸权主义。第二,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自由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主义是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自由民主主义已经与美国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度统一。第三,具有极端倾向。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美国至上主义”。所谓美国至上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信念:美国的理想、价值观和现实都优于任何其他国家。美国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不可不考虑民族主义这个因素。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最高指导思想,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

义、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有机统一体,因此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民族主义还是反共主义的重要根源。美国民族主义从两个方面影响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和政策:第一,“反共主义”具有维护美利坚民族统一的功能;第二,共产主义是美国实现“天定命运”的巨大障碍。反共主义是美国民族主义的应有之义;美国民族主义的内涵和特点,决定了反共主义在美国有着深厚的产生及发展根源。

第三部分有3篇,分别探讨政治文化对中美、中日、日美关系的影响。刘建飞的论文《政治文化对21世纪中美关系的影响》探讨了影响中美关系的两国政治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变化趋势。他认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两国政治家和战略家如何认识、判定、把握双方的利益矛盾和共同利益,而这种认识、判定和把握,在相当大程度上受政治文化的影响。中美都是文化大国,两国政治文化既有很大的差异,也有许多共性。这些差异和共性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影响着中美关系,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就取决于差异和共性的消长趋势。中美政治文化无论是来源还是基本要素都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又导致双方在许多基本价值观上的差异,特别是那些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价值观。概括起来讲,制约中美关系的政治文化因素主要有三类:一是与宗教相关的价值观;二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的价值观;三是民族主义价值观。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影响着美国人的中国观和中国人的美国观。当然,中美政治文化也有许多相近和相融之处,它们又对中美关系发展起着积极作用。首先,中美政治文化都是开放的体系,都是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合理成分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美两国社会也都是开放的社会,正是因为这样,两国才能都成为民族的大熔炉。其次,中美的一些基本价值观相近。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崇尚科学等,是美国人的价值观,也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方法

上中美存在着差异。最后,两国人的思维方式相近。美国人奉行实用主义,中国儒家思想讲中庸之道,现今的中国人讲实事求是。这些都体现了务实精神,而不是固守教条。从长远来看,世界发展趋势有利于中美政治文化相融方面的发展,也有利于减弱和消除政治文化差异因素的消极影响。最主要的世界趋势是全球化。在全球化影响下,各种文化和文明趋向于融合或共同发展,而不是冲突。

查道炯博士的论文《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理解战后日美关系》考察了日美之间政治文化差异和交集的因素。他指出,决定日美双边关系未来发展的因素是:地理位置和战略地理判断、境内经济资源、宗教思潮,以及对历史的认同。日美两国在这些方面既存在着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分歧。就相同之处而言,主要表现为:日美两国均认为自己国家的文明在国际社会中独特;日美两国都将对方看作是最能理解自己的国家;日美两国之间,基于各自对外战略的需要,都认为对方是不可替代的伙伴。就分歧而言,主要是在处理双边关系摩擦时体现出来的,主要有 3 个方面:美国对其对外政策总是做出道德解释,而日本在对外政策中总是表现出协调姿态;双方对“外压”与“内压”有不同的理解;在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问题上双方有不同的看法。

晋林波研究员在《中国人之日本观》一文中,从长远和宏观的角度,分析和概括了明治维新以来中国人对日本人与日本国家所持的总体印象和观念。作者清晰地揭示了中国人日本观的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按时间顺序,作者将之分为六个阶段:从明治维新至甲午战争;从甲午战争至签订“二十一条”条约;从“二十一条”签约至“九一八”事变爆发;从“九一八”事变爆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二战结束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从中日邦交正常化至今。通过对中国人之日本观的历史分析,作者指出,虽然从地缘关系上看,中日两国关系经常被形容为“一衣带水”,但是,如果就

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感情的现实发展来看,可以说中日关系事实上经常处于一种“比邻若天涯”的疏远与冷淡状态之中。即使在今天,中日关系的现状仍然包含着形势严峻和前景堪忧的一面。虽然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正日益密切,但是,两国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并未消除。究其原因虽有许多方面,但中日之间相互认识上存在的观念差异和分歧,无疑构成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看,本课题从政治文化因素对中美日之间双边及三边关系的影响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相信,这些成果对读者理解中美日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会有很大帮助,同时对学界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也是很有裨益的。

三

值得一提的是,本课题是对国际关系中政治文化因素研究的初步尝试,虽然论文作者都提供了高质量的论文,但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论述问题,而且由于所涉及的论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各篇论文之间缺少相互照应,甚至在一些基本概念上都没有统一的说法。就拿本课题最核心的概念——“政治文化”——来说,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理解和界定。不过,我认为,这并不影响对课题内容的研究。本课题的宗旨是研究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和国家间关系的影响,而不是对“政治文化”概念本身进行辨析,所以只需对“政治文化”概念有个总体的了解就可以了。其实,论文作者们在使用“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时,大体含义是一致的。简单地说,所谓政治文化就是文化的政治层面,主要是关于国家、民族、社会 and 个人的价值观以及国民的处世哲学和思维方式。

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的《什么是政治文化》一文对“政治文化”概念作了这样的阐释:如果我们做一个比喻,把政治体系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那么,各种制度化和结构

化的政治组织、机构和规则,可以说是政治体系的“硬件”部分,而构成“软件”的东西则是政治文化。犹如计算机运行需要软件、硬件相互兼容一样,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也需要相互匹配。政治文化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它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由于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关系密切,政治文化研究也就成为政治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又由于政治文化反映了政治体系的特点,故而研究政治文化的特征可以作为研究政治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政治文化包含意识形态,但比意识形态的外延要广,而且更具有稳定性。一个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可以随着政治制度或当权者的变化而变化,但政治文化却不会完全改变。一个国家或民族政治文化的许多要素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

笔者基本上认同上述对政治文化概念含义的阐释。顾名思义,政治文化就是政治与文化的有机交叉与融合,就像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一样。因此,政治文化具有两方面的属性,一是政治的属性,一是文化的属性。就政治属性来说,政治文化具有统治性和阶级性,它反映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很相近,它会随着统治阶级施政目标和理念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中国在 20 世纪就发生了多次显著的变化。从晚清政府到国民党,再到共产党,是截然不同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改革开放前后,也有很大差别。就文化属性来说,政治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大众性。所谓大众文化,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它反映了一个民族比较稳定的处世哲学和思维方式,不依执政者及施政目标和理念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中国人的“大一统”思想,沿袭了几千年。

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时常出现两个层面内容相脱离的情况,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资本的本质决定,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只能是维护少数资本家的利益。当然,从资产阶级的长